

俄國第一份漢學集刊 《俄國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

*An Anthology of Member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Beijing:
Russia's First Publication on Sinology*

陳開科 (Chen Kailkel) *

19世紀中葉，俄國第一份漢學研究的學術集刊《俄國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以下簡稱《著作集》）出版發行。雖然它只連續出版了4集，但其學術影響卻很大，不但及於俄國漢學界，而且還及於歐洲漢學界，甚至超出了漢學研究領域。以下，我們就來簡要分析一下這份漢學集刊於中俄文化交流乃至中俄關係中之意義。

一、《著作集》的出版緣起諸問題考

關於這份漢學集刊的緣起問題，目前就我們所能看到的資料，許多細節仍無法弄清楚。只有一點非常清楚，就是「毫無疑問，巴拉第是這份漢學集刊的首倡者」。¹但是，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 1817-1878，教名Палладий）什麼時候、通過什麼途徑和形式來首倡出版編輯這份漢學集刊的？所有談及此事的著作都沒有提到。這件公案恐怕要等到所有巴拉第的檔案全部被整理出來以後才能弄清。²在這裏，我們所能作的不過是利用手頭的材料，對其中的細節進行一些有限的補充。

其一，首倡者雖然是巴拉第，但當時他在北京，不

可能具體參與《著作集》的編輯，具體工作都是切斯諾伊作的。切斯諾伊（Д.С.Честной, 1799?-1866），是第11屆北京佈道團司祭，他回俄國後，就在外交部亞洲司工作，專門編輯管理來自北京佈道團成員的學術著作。³正因為職務上的便利，所以就自然就成了《著作集》的編輯。「切斯諾伊曾評論過很多他的北京同事和朋友的著作，但大都是手稿」。⁴他工作非常認真，而且鐵面無私。斯卡奇科夫說，切斯諾伊在編輯《著作集》時，對質量不高的文章就毫不猶豫地淘汰：「一些文章被他堅決拒絕，例如：阿沃多夫的《俄國連》，伊萬洛夫的《列子》等等」。⁵也許正由於切斯諾伊的認真態度，才使這個漢學集刊的學術水準較高，得到了評論界的充分肯定。更重要的是，切斯諾伊與巴拉第關係一直很密切，1856年，巴拉第曾從北京寫信和他討論Н·舒金的《阿莫爾河史》，⁶學術上的密切聯繫是他們合作的前提。

其二，我們在閱讀國立俄羅斯歷史圖書館工作人員塔拉卡洛夫的報告《有關П.И.卡法羅夫的俄文圖書目錄資料》時，發現只有前3集《著作集》算在巴拉第編輯的成果之列，而第4集則排除在外。⁷根據斯卡奇科

*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 Никифоров В.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1970г.стр.8: Скачков, П.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 С. 170.

2 有關出版《著作集》的資料保存在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347，1-5，No. 1，案卷74。

3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1-5，1823年，案卷1，卷夾2，頁61、101、139、162。

4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1-5，1823年，案卷74，頁9-45。

5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347，1-5，No. 1，案卷74，頁453-458。

6 俄羅斯國立伊爾庫茨克州檔案館，全宗774，目錄1，案卷343，附件6/д。

7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г.часть III, С.161-162.

夫的考證，《著作集》第4集的編輯者是瓦西里耶夫院士，他說：「最後一集即第4集出版於1866年，收集的全是巴拉第這個《著作集》臺柱子的文章。有證據表明，這集的編輯是瓦西里耶夫院士。他當時正好在亞洲司任職，是他主張要繼續出版這份漢學集刊。」⁸ 根據檔案材料，瓦西里耶夫1862-1867年期間任亞洲司翻譯，職位是五等文官。⁹ 但他只是兼職，並沒有專門去亞洲司任職。¹⁰ 他仍然忙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的教學管理工作。¹¹ 本來，19世紀的俄國由於擴張導致財政緊張，因此出版漢學著作很不容易，瓦西里耶夫本人的漢學著作就有一大半沒有出版。¹² 巴拉第在北京時，也不止一次寫信向亞洲司反映這個問題。¹³ 也許由於瓦西里耶夫在沙俄朝野聲譽甚隆，所以，亞洲司不能不在乎他的意見。但瓦西里耶夫的建議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因為我們發現，巴拉第和當時亞洲司司長奧斯丁·薩克恩私人關係似乎很好。1865年，巴拉第在給奧斯丁·薩克恩的信中，談到有關成吉思汗譜系的著作時（應該指《聖武親征錄》）寫道：「樂意，還是不樂意把這部著作在《著作集》第4集付印，全在乎您。可能遲了，如果是這樣，那就請您不要花精力了。」¹⁴ 果然，後來《聖武親征錄》未在《著作集》第4集刊布，直到1877年才刊布在《東方文集》裏。1866年8月7日，巴拉第在另一封信中對奧斯丁·薩克恩深表謝意：「您出版了我的譯注作品，對您為我所作的一切，我不知道怎麼感謝您呢？」¹⁵ 由此可見，可能奧斯丁·薩克恩才是出版《著作集》第4集的關鍵人物。斯卡奇科夫和霍赫洛夫可能都忽略了這個奧斯丁·薩克恩。

其三，19世紀中葉以後，沙俄外交部亞洲司隨著政府對東方的關注，其本身也開始具有東方學研究的性質，¹⁶ 表現之一就是其組織編輯出版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出版物：「早在1840年，亞洲司就開始醞釀出版其所收藏的有關東方的手稿和書籍的目錄索引（這個工作一直在繼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擴展至1860-1910年間）。從1861年到1916年，俄國外交部一直出版年鑒。這些年鑒，除了外交部的一般指南外，還出版一些特別重要的來自政治信件的文件」。這些出版物舉其要者有：《著作集》，聖彼得堡，1-4集，分別於1852年、1853年、1857年、1866年出版；《東方文集》，聖彼得堡，1877年；《俄國和外國所簽訂的各種有效的條約、協定以及涉及各種問題的國際私法檔案集》，1-4集，聖彼得堡，1889-1896年；《確定俄中雙邊關係的國際決議集（1869-1897）》，聖彼得堡，1900年；《1869-1881年間俄中條約集》，聖彼得堡，1889年；《蒙古問題外交文件集（1912.8.23-1913.11.2）》，聖彼得堡，1914年；《遠東事務條約和外交檔案集：1895-1905》，聖彼得堡，1906年。¹⁷ 這說明，《著作集》的出版，只不過是亞洲司出版計畫中的一環，而且是第一環，可見，《著作集》是俄國政府關注遠東政策的產物。1877年，《著作集》改名為《東方文集》，又繼續出版了1集。

二、《著作集》的作者群和作品類型分析

爲了分析的方便，我們現將其篇目翻譯成漢語。篇

8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 С.170.

9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347，IV-1，目錄117，1862-1867年，No. 6，頁28。

10 俄羅斯國立列寧格勒歷史檔案館，全宗14，目錄1，案卷5501，頁236。

11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1997г. стр. 269.

12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М. 1974г. стр. 23.

13 俄羅斯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手稿部，全宗356，第298保存單元，頁6。

14 俄羅斯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全宗1385，目錄1，第1608保存單元，頁14。

15 俄羅斯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全宗1385，目錄1，第1608保存單元，頁18。

16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1997г. стр. 116.

17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1997г. стр. 121-122.

目以蔡鴻生譯文為準，¹⁸ 篇目前加統一編碼（以下論述即用編碼代替作品名稱）。

第1集，1852年，聖彼得堡。

1. 戈爾斯基，〈滿族先世的肇始與發跡〉。
2. 戈爾斯基，〈清室源流與滿洲名義〉。
3. 雜哈勞，〈中國戶口歷史概覽〉。
4. 戈什克維奇，〈中國人的脂粉調製法〉。
5. 巴拉第，〈佛陀傳〉。

第2集，1853年，聖彼得堡。

6. 雜哈勞，〈中國土地所有制〉。
7. 巴拉第，〈古代佛教史綱〉。
8. 戈什克維奇，〈中式算盤〉。
9. 固里，〈中國佛徒發願出家儀式〉。
10. 塔塔利諾夫，〈中國醫學〉。
11. 伊拉里昂，〈中國西藏關係史綱〉。

第3集，1857年，聖彼得堡。

12. 赫拉巴維茨基，〈甲申之變——明朝覆亡之際的北京事變〉。
 13. 茨威特科夫，〈中國鹽法志〉。
 14. 戈什克維奇，〈山藥（土豆）栽培〉。
 15. 戈什克維奇，〈御膳用得著香稻米〉。
 16. 塔塔利諾夫，〈中國麻醉術與水療法評介〉。
 17. 茨威特科夫，〈中國人對長崎的記述〉。
 18. 茨威特科夫，〈基督教入中國考〉。
 19. 茨威特科夫，〈七世紀的景教碑〉。
 20. 茨威特科夫，〈中國禮俗〉。
 21. 巴拉第，〈津滬間的海上交通〉。
 22. 戈什克維奇，〈香港〉。
 23. 戈什克維奇，〈養蠶法〉。
 24. 茨威特科夫，〈道教〉。
 25. 葉夫拉姆皮，〈關於鈔法的會奏〉。
- #### 第4集，1866年，聖彼得堡。
26. 巴拉第，〈元朝秘史譯注〉。
 27. 巴拉第，〈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注〉。
 28. 巴拉第，〈中國回教〉。

《著作集》總共4集，收文章28篇，作者共十位，

分別是：

1. 神父5名：巴拉第、固里（Гурий Карпов）、伊拉里昂（Михаил Оводов）、茨威特科夫（Петр Цветков）、葉夫拉姆皮（Елисей Иванов）。
2. 學員4名：戈爾斯基（В.В.Горский）、雜哈勞（И.И.Захаров）、戈什克維奇（И.А.Гошкевич）、赫拉巴維茨基（М.Д.Храповицкий）。
3. 醫生1名：塔塔利諾夫（А.А.Татаринов）。

首先，這十位作者中，有4位是大學生，1位醫生，5位神職人員，神職人員佔50%，而且都集中在第12屆和第13屆佈道團中。可見，在俄國佈道團漢學體系中，專業神職人員一直是漢學研究的主體，這和當時俄國佈道團漢學研究的整體情況是相符的。

其次，這些作者中，無論是學生，還是專業神職人員，除了3位（伊拉里昂、茨威特科夫、葉夫拉姆皮）情況「不明」者和醫生外，都畢業於聖彼得堡神學院，這足以構成19世紀中葉俄國漢學研究領域的「聖彼得堡神學院系統」。這種親緣關係自漢學研究有大成的12屆佈道團以後就特別明顯。這與19世紀中葉以後形成的以瓦西里耶夫院士為中心的「聖彼得堡大學系統」相映成輝。顯然，沙俄政府很有分寸地把握了這種情況，這套《著作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種情況的體現。

其三，從作品的性質看可以分為兩大類：翻譯和研究。屬於翻譯類的有7篇，分別為前述作品之13、18、20、23、25、26、27。其中，除25外，其他6種翻譯作品都有譯者序言。作者的觀點、學術修養等大都彰顯於序言。此外，巴拉第的兩種翻譯作品還附有大量注解：《元朝秘史譯注》有注解660條，《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注》有注解600條。它們完全屬於「譯注」作品。雖然這些翻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但並不影響這些作品的文化傳播意義。

而屬於專題研究類的有21篇，佔整個作品的75%，它們是集中代表19世紀中葉俄羅斯漢學研究水準的因素。考察俄國漢學的發展軌跡，在比丘林之前的一個多世紀，佈道團幾乎沒有進行像樣的漢學研究，比丘林對此多有批評：¹⁹「根據他的看法，一百多年來，佈道團

18 參見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15-117。

19 俄羅斯國立中央歷史檔案館，全宗796，目錄86，No.167，頁413。

沒有『為科學、為國家』帶來任何利益。』²⁰ 應該說俄國真正意義上的漢學研究是從比丘林開始的，他的著作「在俄國東方學史上開啓了嶄新的一頁」，²¹ 但比丘林的漢學作品大部分是翻譯作品。蘇聯漢學家在談及比丘林的作品時就說「比丘林已經出版了的著作的大部分是有關蒙古、卡爾梅克、西藏及其他各民族歷史的漢語資料的翻譯；在未出版的手稿裏還有關於中國國家和人民的歷史資料翻譯」。²² 然資料翻譯離嚴肅的漢學研究還有一段距離，嚴肅的漢學研究必須是專題論文。從《著作集》來看，這種情況到 19 世紀中葉已經得到了澈底改變。《著作集》表明，俄國的漢學研究從以「翻譯和收集資料」為特徵的比丘林時代，過渡到了以「研究分析」為特徵的「瓦西里耶夫時代」了。

三、《著作集》的內容分析

從作品內容來看，我們可以把《著作集》裏的作品大致分為四大類：社會歷史類，包括 6 篇作品：1、2、3、12、25、26，主要內容為明清史、人口史研究；科學技術類，包括 7 篇作品：4、8、10、14、15、16、23，主要內容為農業技術、數學、中醫、化妝品；宗教風俗類，包括如下 8 篇作品：5、7、9、18、19、20、24、28。主要內容為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民俗；經濟、貿易交通關係類，包括 7 篇作品：6、11、13、17、21、22、27，主要內容為中國內地與西藏的關係、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中國內地與香港、中國與西域中亞的關係等。綜合分析，《著作集》在內容方面至少有如下特點：

（一）全面反映了俄國駐北京佈道團 19 世紀的漢學研究旨趣

大部分文章都擁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它們大都是同類相關研究中的佼佼者，足以代表當時俄國漢學的研究水平。主要體現為開闢了新領域、提出了新問題、有新觀點。比如雜哈勞的〈中國土地所有制〉和〈中國戶口歷史概覽〉，前蘇聯漢學家尼基福羅夫就認為：「N. N. 雜哈勞抓住了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中國的人口和土地制度。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就沒法從整體上得出有關中國歷史的正確結論」²³「雜哈勞對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不僅對科學，對蘇聯科學都有著特殊的意義」。雜哈勞在對中國土地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歷史考察後得出結論，自 780 年稅法改革「在恢復人們無限制地佔有土地的權利後，這種所有權在中國延綿了一千多年而沒有變化」，²⁴ 這種土地制度就是「由大地主佔統治地位的國家私有土地制度，作者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封建主義』，但是他的思想卻有這種趨向」，「實際上，雜哈勞是俄國第一個研究中國歷史中最基本社會經濟問題並寫出專題研究著作的人」。²⁵ 可見，前蘇聯漢學界對雜哈勞的著作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蔡鴻生將〈中國戶口歷史概覽〉的性質界定為「一部國際漢學界罕見的人口史」，²⁶ 亦可謂慧眼獨具。而整個 19 世紀，西方漢學界幾乎沒有誰認真觸及過這兩個基本問題。雖有哲美森《中國的地權及農村生產的條件》（1888 年出版）之類的著作出版，但其材料不是來自官方書籍，而是「源於浙江杭州的美國長老會派教士 J. F. 詹森」²⁷ 的實地考察，根本沒有涉及歷史資料，缺乏歷史考察和科學分析，其意義和雜哈勞的著作自不可等量齊觀。

19 世紀俄國漢學旨趣是相當獨特的，最主要的表現之一就是對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進行了充分的注意。因為中國的科學技術資訊並非沙俄政府所急需的資訊，《著作集》能大膽設專題發表有關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的

20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 С. 95.

21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 С. 100.

22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1970г. стр. 6.

23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1970г. стр. 8.

24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1866г. СПб, Т. II, С. 26.

25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1970г. стр. 9.

26 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頁79。

27 (英)約·羅伯茨，《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頁133-134。

文章，實在應該歸功於編輯的獨具匠心。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此舉確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後，俄國漢學界就再也沒有過這樣的精彩了。

就當時俄國駐北京佈道團成員組成上來說，俄國佈道團關乎科技的成員只有醫生和極少數學員。醫生被派遣到中國的目的在於「能給我們帶來好處，他們通過自己的醫術和幫助可以使我們在北京獲得信任」，²⁸根本不具有什麼科學研究目的。這些醫生後來從事科學活動，全憑自己的興趣。到19世紀60年代止，俄國向北京佈道團共派遣了五位醫生：沃伊采霍夫斯基（1793-1850）、基里諾夫（1801-1864）、塔塔利諾夫（1817-1876）、巴基利夫斯基（1822-1878）和科爾尼耶夫斯基（1833-1878）。其中，沃伊采霍夫斯基成了漢學家；基里諾夫成為茶葉研究專家；巴基利夫斯基則興趣廣泛，既研究中國古代的醫學，又研究中國的植物學、動物學、地理學。巴拉第於1854年3月14日寫信報告亞洲司：「巴基利夫斯基醫生從專業和業餘角度，收集了有關中國各個時代獻身於醫療事業的名醫們的資料，以及與中國醫學歷史相關聯的其他專案的資訊。隨後，他又著手準備自然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著作，打算收集盡可能準確、完整的有關中國兩條大河：長江和黃河流域的資料，以及山勢的走向，所提河流域的特點。除此之外，他還繼續研究動物學」。²⁹據說他在「恰克圖周圍收集了140種植物標本，並把它們寄給了費·費瑟爾。在這裏，他甚至找到了蒙古烏龜，把它寄給了醫學化學科學院」。³⁰巴拉第多次把巴基利夫斯基收集的動植物標本郵寄給亞洲司和莫斯科自然實驗協會；³¹塔塔利諾夫則特別喜歡收集植物標本。他曾請一位不知名的中國畫家為他畫了一本北京地區植物群的畫冊，裏面有452

種詳細的植物圖畫。³²他也研究中國醫學，「對漢語的精通，對中國文化的深深敬仰，使塔塔利諾夫向俄國醫生和自然科學家們，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醫學及其第一手資訊」。³³他的基本醫學著作大約有10幾種，而〈中國醫學〉和〈中國麻醉術與水療法評介〉兩篇文章則入選發表在《著作集》裏；至於科爾尼耶夫斯基，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的醫學〉、〈中國醫學史資料〉和〈中國醫學歌訣〉等，³⁴大都發表在俄國國內的醫學專業雜誌上。

至於學生，從事科學研究的主要有第12屆佈道團的戈什克維奇和第13屆佈道團的斯卡奇科夫。從作品看，戈什克維奇的興趣也很廣泛。涉及農業、數學和化妝品等。他和斯卡奇科夫比較，更注重研究分析。這也是他的作品有好幾種入選《著作集》的原因。

儘管俄國駐北京佈道團也有上述值得驕傲的科學研究成果，但比起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卻差之甚遠。俄國駐北京佈道團，在19世紀60年代前（第1至第14屆）從事科學研究的學生和醫生，總共不過7人，僅佔14屆來華佈道團總人數156人的4%。歷史地考察，俄國佈道團在中國的科技活動主要是單向的，而且規模極小。雖然也進貢「自鳴鐘」等物，³⁵也有贈送科技書籍之舉，³⁶但要麼不具有科技意義（僅僅具有文化交流意義），要麼沒有被重視而產生什麼實際的科技意義。

在《著作集》所收集的幾篇科技文章中，以戈什克維奇的〈中式算盤〉和塔塔利諾夫的〈中國醫學〉科學意義較大。戈什克維奇在〈中式算盤〉裏，對中國算盤的結構和運算機制進行了詳細地介紹，對中國算盤智慧深深佩服。說「技術高超的打算盤者用右手四個手指撥動算盤，好似撥動樂器，毫不誇張地說，是在彈奏整

28 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 "Пеки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см. Атеист. М. 1930 г. No. 49. стр. 13.

29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5，1823 年，案卷 1，卷夾 51，頁 677。

30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5，1823 年，案卷 1，卷夾 45，頁 48、49、51。

31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5，1823 年，案卷 1，卷夾 51，頁 518、632、611。

32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88 г. No. 6, стр. 28-32, 90-94.

33 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5 г. стр. 160.

34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г. No. 4, стр. 146.

35 《歷史檔案》，2005:1:45-49。

36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1，1844 年，案卷 154，頁 7、9。

個數字和絃」。³⁷ 還與俄國算盤進行比較，最後承認「在我們還沒有想出適用於我國算盤的同樣簡捷可行的除法運算方法之前，中國算盤將始終佔優勢」。³⁸ 無獨有偶，同時期歐洲人也對中國的算盤很注意。德庇時在其〈中國雜記〉中，就由衷佩服中國的算盤：「算盤的實際功用，正如他們所使用的那樣，超過了巴貝吉先生聞名遐邇的計算器，是無與倫比的，其工作模式應該普遍瞭解，這種工具應該推廣使用。……在我看來，它真是一件極其奇妙又重要的東西。我們從中國人那裏已經學到很多東西，再多學一樣也不會使我們感到難堪。」³⁹ 這樣的表白，聽起來自然令人舒服。整個近代中國在西方人眼裏一無是處，也就只有靠算盤這類小事來撐門面了。

（二）幾乎所有文章都建立在翔實而豐富的原始資料基礎上

詳細佔有第一手資料，這是當時俄國漢學的治學方法。而且，最難得的是開始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些資料，這是其研究方法近代化的體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著作集》奠定了近、現代俄國漢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石。

以第三類「宗教風俗」文章為例。歷史上，中國的宗教一直是俄國漢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從這些文章的篇目來看，不但涉及到了道教等主要中國本土宗教，還涉及到了西方基督教、回教和印度佛教等外來宗教。不用說，所選刊的這些相關著作，無疑都是當時最傑出的著作。像巴拉第的〈佛陀傳〉及〈古代佛教歷史綱要〉就是當時詳盡佔有漢語資料的研究典型。為了寫這些著作，巴拉第孜孜不倦地閱讀原始佛經，數量達 750 卷之多。⁴⁰ 而為了完成短文〈中國的回教〉，巴拉第收集了

當時三十多種漢語回教史資料中的 25 種。⁴¹ 也許正因為立足於最充實的資料，所以，〈中國的回教〉文章雖短，但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當時聖彼得堡大學的格裏戈裏耶夫教授評論道：「巴拉第神父第三方面也是最新的貢獻在於那篇篇幅不大的有關穆斯林在中國的文章，這個課題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沒有一個歐洲漢學家不為此而感動的。」⁴²

從方法論角度來說，《著作集》也有超越之處。前蘇聯漢學家尼基福羅夫就認為《著作集》作者之一雜哈勞的作品在方法論上超越了前輩比丘林：「相對於比丘林對社會經濟問題的關注來講，雜哈勞的特點是（在很大程度上）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資料」。通觀雜哈勞的〈中國人口歷史概覽〉，到處可以看到懷疑和糾正古代中國官方人口歷史材料的痕跡。當談及滿清 18 世紀過多的人口時，雜哈勞明顯表示懷疑：「儘管我們相信政府的檔，但仍對正式公布的如此龐大的居民人口有些疑慮。我們的懷疑意見來源於：1. 中國人口增長的歷史進程；2. 在中國進行人口統計時所出現的舞弊行為……。」⁴³ 他這樣做，目的是「不希望像歐洲學者就這個專題領域通常所作的那樣，通過自己的結論來誤導讀者」。⁴⁴ 同樣，這種批判方法也充分體現在巴拉第的著作裏。

（三）部分文章是沙俄侵略政策的應聲蟲、前奏曲

這也是俄國漢學實用性的體現。也正因為如此，其中一些錯誤觀點需要我們加以批判。

首先，俄、中之間地區的民族歷史和文化，自比丘林以來就一直為俄國政府所關注。比丘林曾說過「研究的順序應以西藏，突厥和蒙古為先，因為這些地方自古以來就和中國緊密相連，而中國本身也正是經過這些地

37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1866г. СПб, Т. II, С. 100.

38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1866г. СПб, Т. II, С. 113.

39 (英) 約·羅伯茨, 《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北京:時事出版社, 1999), 頁73。

40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г. No.4, стр. 208.

41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г. стр. 177.

42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66г. Т. 11, No.5 (03. Октября 1866г.), стр. 157-161.

43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1866г. СПб, Т. I, С. 193.

44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1866г. СПб, Т. I, С. 203.

方與印度，中亞及俄國發生關聯」，⁴⁵強調漢學研究要為國家利益服務。遵循比丘林的傳統，在漢學特別發達的第12、13屆佈道團群英裏，就有不少人對研究蒙古、西藏和中亞的社會歷史感興趣，而且成果倍出。巴拉第所譯注的《元朝秘史》，至少從資料的角度看就是所有同類著作中最重要的。此前，俄國學術界不知道還有《元朝秘史》一書的存在。巴拉第的譯著，有力地推動了俄國蒙古史的研究。當然，研究和瞭解正在和俄國打交道的滿清的歷史淵源，自然是俄國政府的當務之急。如果切斯諾伊在編輯文章時，考慮到了這點，那麼，這也許就是〈清室源流與滿洲名義〉和〈滿族先世的肇始與發跡〉被置於首要位置的原因。

至於雜哈勞的〈中國土地所有制〉和〈中國戶口歷史概覽〉則更加耐人尋味。雜哈勞一生主要從事外交活動，多次充當侵華的急先鋒。⁴⁶這裏選擇的兩篇文章是他40年代在北京的習作。至於其被選刊的原因，只要聯想到俄國一貫的對外侵略政策，就會迎刃而解。19世紀中葉，正是沙俄把侵略的重心移向遠東的轉折時期。按照他們一貫的侵略原則，就像在中亞所作的那樣，跟隨軍事征服之後的就是移民，移民政策成了他們國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⁴⁷而移民的本質就是俄國化。所以，研究邊遠地區和周邊被侵略國的土地制度和人口構成自然成為當務之急。像19世紀末到北烏蘇里邊區調查的納達羅夫，每到一個地區，就要把這該地區居民的民族構成、男女人口數量、甚至房屋數量等都記載得清清楚楚。⁴⁸沙俄的急於侵略首先表現為急於瞭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那麼，作為出版商的外交部亞洲司，理所當然要按照自己的需要來選擇出版的文章。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雜哈勞這兩篇不起眼的文章被選中了。儘管就作者本人而言，這並非其主要作品。但就政

府而言，這卻是為其政策服務的佳作。19世紀60年代，曾活躍在中俄西北邊疆的沙皇寵臣巴布科夫上將就曾從這些著作中吸取營養。他說「在我所讀過的關於中國的一切著作中，使我感到印象最深的是早夭的中國學青年學者戈爾斯基的〈清室源流與滿洲名義〉和〈滿族先世的肇始與發跡〉，雜哈勞〈中國人口歷史概覽〉，修士大司祭巴拉第所著《佛陀傳》、《古代佛教歷史綱》。」「閱讀這些著作（我在某些場合曾做過摘錄）使我能初步地，當然是膚淺地，也可以說是抽象地瞭解到中國人的國家和社會生活的特點，瞭解到中國政治史上最突出的事件」。⁴⁹

至於伊拉里昂〈中國西藏關係史綱〉中的濃厚的殖民主義觀點，尤其需要批判。我們知道，自古以來，西藏就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可是，作者卻把「中國」和「西藏」看成是兩個國家。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被看成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一開篇，作者就說：「中華帝國和西藏的交往始於西元七世紀」。⁵⁰還說中國政府對待西藏政策的特點是「通過招撫和優待來控制近鄰，以此換取和平和順從」。⁵¹公然將西藏看成是中國的近鄰。其實，作者的這些看法並不是孤立的，它是19世紀中葉以來沙俄日益關注西藏，妄圖侵略西藏的戰略目標的體現。歷史上，沙俄對西藏的侵略分為三部曲：第一步，借助「駐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結交清廷權貴和蒙、藏等族的上層人物，搜求文獻資料，研究關於西藏的情況」；⁵²然後，是所謂「科學考察」。最先赴西藏考察的就是那位極力為沙皇侵略政策服務的所謂「科學考察專家」普爾熱瓦爾斯基。1878年，他向總參謀部和地理學會申請去西藏考察。他說「達賴喇嘛的權力不亞於中世紀羅馬教皇的權力……安撫他，籠絡他，如有可能就和他交朋友——我覺得俄國正可以

45 Бичурин Н.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2002г. стр. 31.

46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7，頁4。

47 孟楠，《俄國統治中亞的政策研究》（烏魯木齊：新疆大學，2000），頁134。

48 伊·納達羅夫，《北烏蘇里邊區現狀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18-19。

49 伊·費·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上冊，頁119-120。

50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1866г. СПб, Т. II, С. 261.

51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1866г. СПб, Т. II, С. 265.

52 《沙俄侵華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第4卷，頁679-680。

從中得到可觀的利益」。⁵³這是沙俄侵略西藏嘴臉的徹底暴露；第三步，到19世紀末，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公開提出「把西藏併入俄國」⁵⁴的想法。並利用貿易便利和軍火誘惑，積極策動西藏上層靠向俄國懷抱。由上可知，伊拉里昂的〈中國西藏關係史綱〉就是沙俄侵略西藏第一步計畫的產物，是沙俄侵略的前奏曲。可是，直到現在，他們有些學者還不肯承認這點，還認為「俄國沒有，從沒有制定過積極的西藏政策」，那種認為「俄國在西藏實行了擴張與陰謀的政策」的觀點「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區」。⁵⁵如果說，人們在俄國與西藏關係的認識上真有誤區的話，那麼，這種漠視歷史事實的看法才真正是誤區。

四、《著作集》的反響和意義

《著作集》出版後，曾引起俄國學術界，尤其是漢學界的關注。每出版1集，就有人在重要雜誌上撰寫評論文章進行評述。

《著作集》第1集，1852年出版。1853年就有匿名作者在雜誌《莫斯科人》上發表評論，對巴拉第的文章〈佛陀傳〉大為讚賞。⁵⁶《著作集》第2集，1853年出版。同年，一位以Н.И.署名的作者在《國民教育部雜誌》上發表評論，主要評述了巴拉第的〈古代佛教歷史綱要〉，同樣是讚譽有加。⁵⁷

1854年，有署名Д.的作者，在雜誌《莫斯科人》上集中評述了《著作集》的第1、2集。作者從學科知識角度，對巴拉第的著作進行了批判性的評論。認為巴拉第在撰寫佛教著作時，沒有參考梵文原典資料，且對待資料缺乏批評的態度。⁵⁸

《著作集》第3集，1857年出版。同年俄國著名東

方學家別列津在《祖國紀事》上發表評論，以嚴肅的態度全面評論了第3集中六位作者的文章。其中評論最為詳細的就是〈甲申之變——明朝覆亡之際的北京事變〉（赫拉巴維茨基）。表面上看，這篇文章對沙俄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可評論者卻說「儘管其所涉及的時代已經久遠，但是，仍然具有現代意義：文章中所描寫的那次變革，像中國的其他變革一樣，僅僅是王朝的更替，和現在於中國發生的災難非常相似，其中所述說的因果便於對當代中國的局勢進行推論」，這還真有點從字裏讀出字來的味道。但是，評論家對其作品終究還是不滿意：「赫拉巴維茨基提供了一些明朝覆滅目擊者們的敘述，可是，他只是這些資料的翻譯，沒有加以解釋；很多地方充斥著狹窄的東方看法」。⁵⁹對於別列津的評論，斯卡奇科夫指出「評論的所有內容都充滿著不善，整個評價是不公平的」。隨後，斯卡奇科夫就以事實對之進行了有力的駁斥。⁶⁰

《著作集》第4集，1866年出版，全是巴拉第的著作。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教授格裏戈裏耶夫在《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公報》上著文進行了評述，言詞和觀點都充滿熱情。他說「巴拉第神父是我們一流的漢學家，大概整個歐洲還沒有比得上他的」，「這裏面無論哪篇文章都是科學研究的碩果」。在評價〈長春真人西遊記〉時說「……巴拉第神父憑著對道教的深刻瞭解，仔細研究了〈遊記〉後所作的注解，大概，在西方還找不出哪個漢學家能勝任這項工作」。至於巴拉第對《元朝秘史》所作的注解，格裏戈裏耶夫強調指出：「除了解釋含糊不清之處和各種各樣的經文語句外，注釋還包含了大量的古代蒙古歷史的新資訊，這些新資訊都是通過可敬的譯者從中國典籍裏獲得的，是歐洲學者在作同一課題研究時還不知道的。這就賦予注釋以獨立著作的意義，在目前

53 Каринцев Н. А.,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жизнь 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37г. стр. 90-91.

54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1923г. Т. 2, стр. 31.

55 參見李學軍等編，《俄中關係——世紀之交的探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頁237-269。

56 Москвитин. 1853г. Т. 6, отд. 5, стр. 7.

57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53г. No.9, отд. 6, стр.194.

58 Москвитин. 1854г. Т. 11, июнь,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отд. 4 (критика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стр. 109.

59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СПб, апреля 1857г., стр. 74-77.

60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 С. 170.

狀況下，它是我們有關蒙古知識方面最傑出的著作」。⁶¹

由上述評論可知，《著作集》在俄國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在學術史上的不朽地位，不言而喻。在這裏，筆者僅強調如下三點：

1. 從中俄關係史的大背景來看，《著作集》作為 19 世紀俄國第一種漢學連續集刊，第一次大規模地、全面系統地向俄國各界傳播有關中國的準確知識，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俄國人民理解中國文化的文化基礎。同時，《著作集》作為 19 世紀俄國漢學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還對俄國的遠東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俄國學者馬爾堅斯在談到北京佈道團成員的漢學著作時所說：「像雅金甫，達甯，巴拉第和伊薩亞等這些作者的文集，使政府有可能從中吸收最好、最準確的有關中國情況的資訊，以及這個國家的經濟，法律和風俗等各方面情況。……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北京的佈道團對俄羅斯民族做出的貢獻是不小的」。⁶² 所以，《著作集》不僅具有加強俄國正確理解中國的文化交流意義，同時避免不了客觀上幫助俄國侵略中國，以影響中俄關係格局的政治意義。
2. 從學術史的背景看，《著作集》不僅對俄國學術界，尤其是俄國漢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影響及於歐洲。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巨著《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

國人「王茂蔭」，就來自這份俄國漢學學術集刊，⁶³ 據俄國學者統計，《著作集》中的部分文章曾被翻譯成德文、英文、法文、義大利文都多種文字。⁶⁴ 而正是伴隨著《著作集》的這種歐洲影響，俄國漢學開始具有國際影響，這也正是俄國漢學民族化的標誌。

3. 鑒於當時俄國漢學著作出版的可悲命運，我們有必要強調：這套《著作集》，為有限地保存和問世俄國漢學著作做出了很大貢獻。在俄國，由於種種原因，漢學著作的出版非常困難，以至許多漢學家的著作只以手稿的形式存放於檔案館。但是，手稿非常難於保存，而且對後輩漢學家來說，因前輩漢學家的筆跡越來越難於辨認而難於整理。難於整理的後果，就勢必是疏於整理。疏於整理的後果，就勢必導致慢慢遺漏。這種漢學著作的災難，早就有人意識到了。以瓦西里耶夫院士為例，他留下的手稿幾乎是已出版著作的一倍多。這些手稿的命運，本身都帶有濃烈的悲劇色彩。據稱「瓦西里耶夫的悲劇在於……據同時代的人證明，他還在北京的期間所寫就的一些傑出的著作形同廢紙，曾被他的女僕當作引火紙燒掉」。⁶⁵ 所以，從保存俄國漢學研究遺產這個角度來說，《著作集》的出版，實在是功炳千秋！

61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66г.Т.11, No.5 (03.Октября1866г.), стр. 157-161.

62 Ф. Ф. Мартенс.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Пб, 1881г. Стр. 48.

63 參見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頁113-118。

64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 С. 170;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СПб. 1857г. С. 77.

65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1997г. стр. 319.